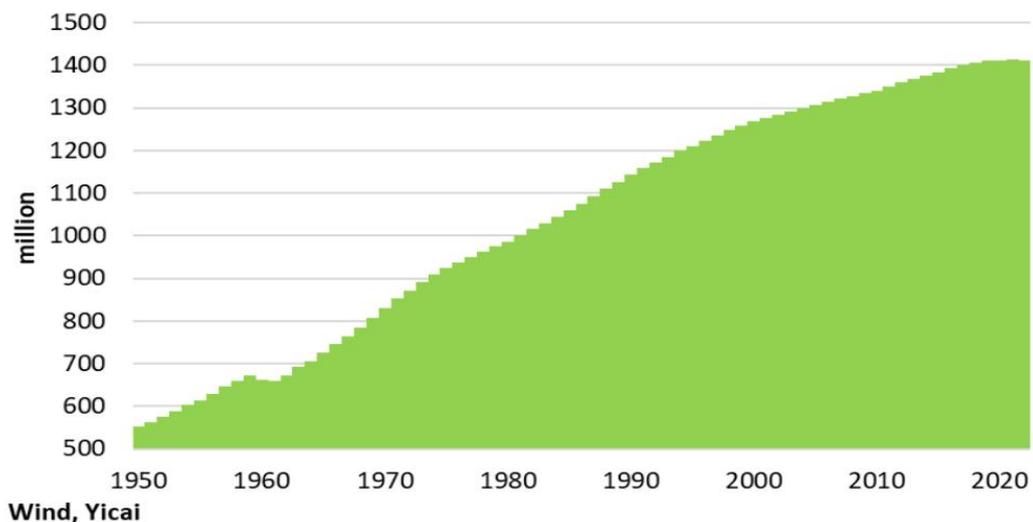


如何看待中国人口总数下降？

中国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人口总数减少了85万。在此之前，2021年中国人口总数接近零增长，表明人口总数已达到峰值（图1）。

2022年是中国人口总数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首次出现下降。人口总数上一次下降是在1959至1961年，总共减少了1350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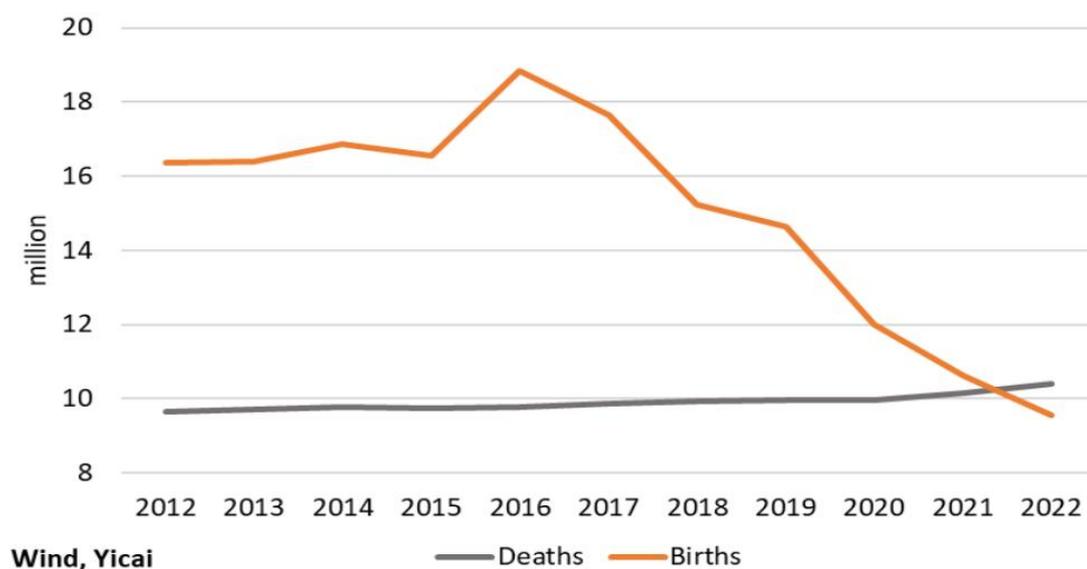
图1：中国人口总数



人口学家一直预测中国人口总数将在本世纪 30 年代初达到顶峰。如果目前的人口走势继续下去，那么中国将比预测时间更早地迎来人口下降压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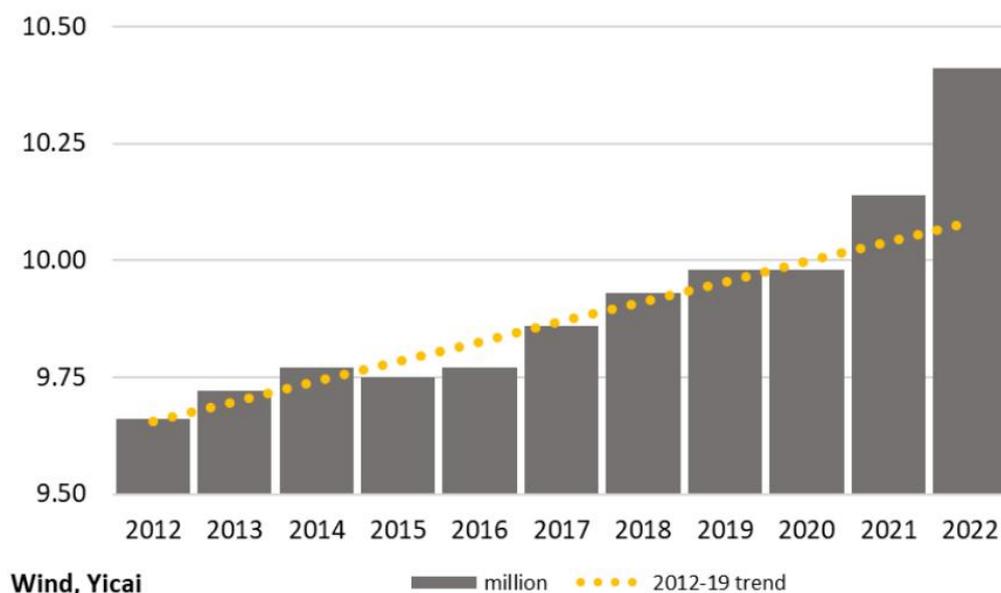
2022 年中国人口总数下降是因为死亡人数（1040 万）超过出生人数（960 万）。从图 2 可以看出，中国的出生人口自 2016 年 1880 万的峰值逐渐下降，死亡人数则略有增加。

图 2：2012 年以来中国每年的出生和死亡人数



中国人口的预期寿命在不断上升。2020 年预期寿命为 78 岁，比 2010 年上升了 3 岁，比 1990 年上升了 9 岁。但是，在过去 10 年里，死亡人数逐年增加。2022 年的死亡人数比简单线性趋势预测得到的数值高出约 32.8 万人。

图 3：2012 年以来中国每年死亡人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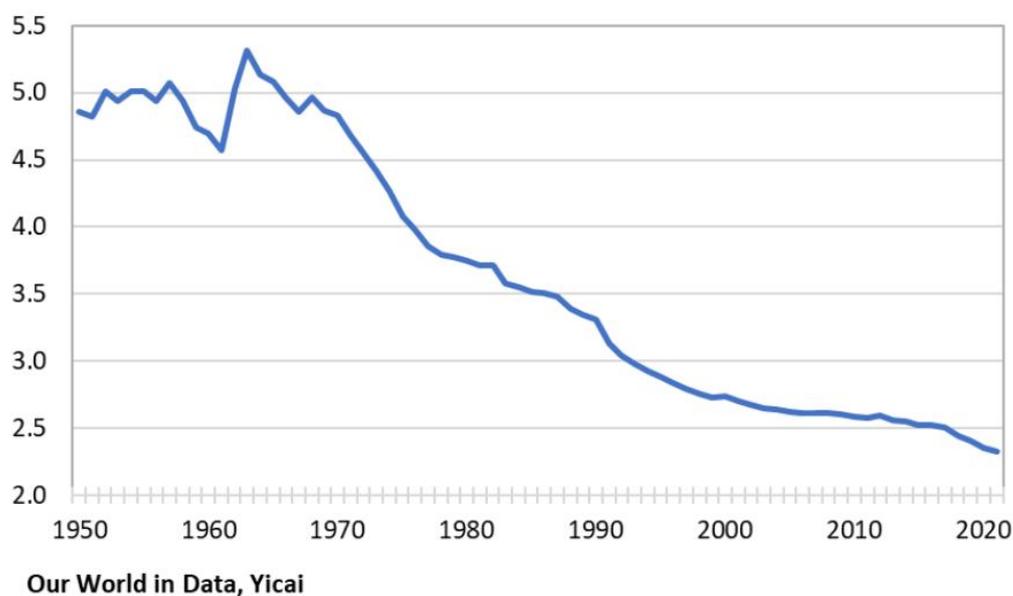


据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司长王萍萍介绍，中国人口总数的下降主要是由于出生人数减少。

王萍萍给出了出生率下降的两个原因。首先，育龄妇女减少。2022 年，21 至 35 岁的女性人数减少了近 500 万。其次，生育率（通常指一年内出生活婴数与同期育龄妇女人数之比）也在下降。王萍萍称生育率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晚婚和对生育态度的改变。

中国女性并不是唯一选择少生孩子的群体，从全球来看，生育率下降是一个趋势（图 4）。1990 年，全球生育率为 3.3。到 2021 年，下降到 2.3。

图 4：全球生育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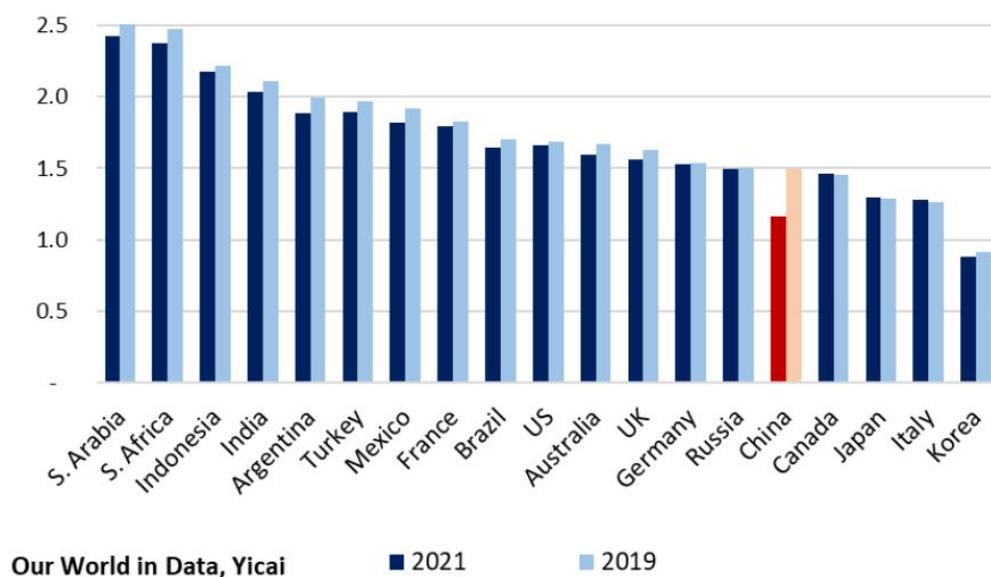


在 G20 成员国中，中国的生育率较低。2021 年，中国的生育率在 G20 成员国中排名倒数第二，仅韩国比中国更低（图 5）。

与 2019 年相比，大多数 G20 成员国的生育率有所下降。这种下降在中国尤为明显。在新冠疫情暴发前的 2019 年，中国的生育率在 G20 成员国中排名倒数第五，略低于俄罗斯，略高于加拿大。

中国的生育率在疫情暴发后出现下降是可以理解的。在过去的 3 年里，我的朋友尽量避免去医院，他们认为去那里会增加感染新冠病毒的几率。这也许是更多女性决定推迟生孩子的原因。

图 5：G20 成员国生育率



除了疫情的因素之外，一些长期因素也使得中国的生育率保持在较低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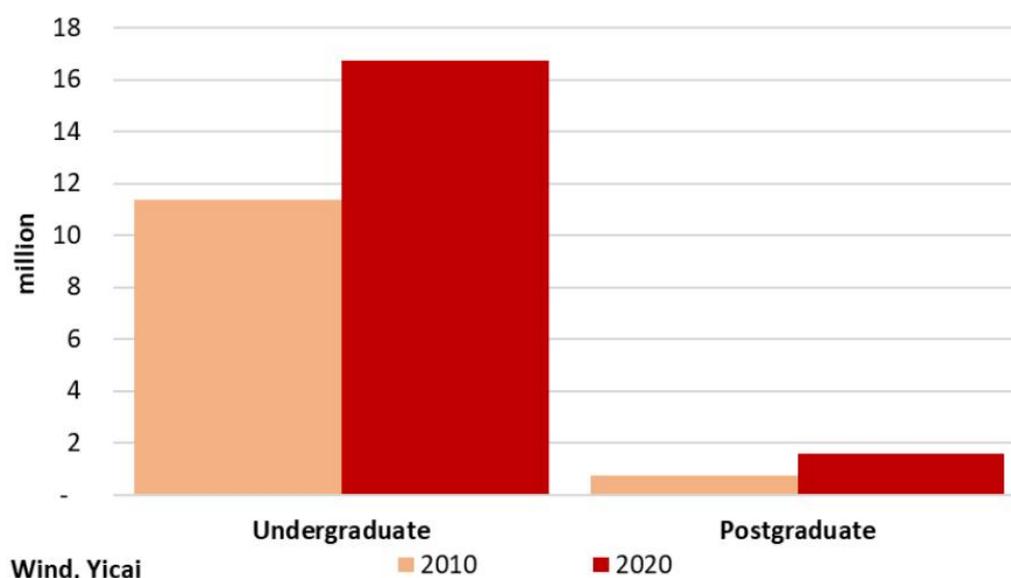
在许多社会中，女性承担了大部分的子女抚养职责。女性生育子女的意愿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她们在家庭之外获得的机遇有多大。这些机遇的价值与女性受教育的程度密切相关。

在过去 10 年里，越来越多的中国女性从高等教育中受益。2010 至 2020 年，大学本科学习阶段的女性入学人数增长了 47%（图 6）。2020 年，女性占大学学生人数的 54%，比 2010 年时的 50%有所提高。

同样，2010 至 2020 年，女性在研究生课程中的入学人数增长了一倍多。2020 年，女性占硕士生总数的 53%，高于 2010 年的 50%；占博士生总数的 42%，高于 2010 年的 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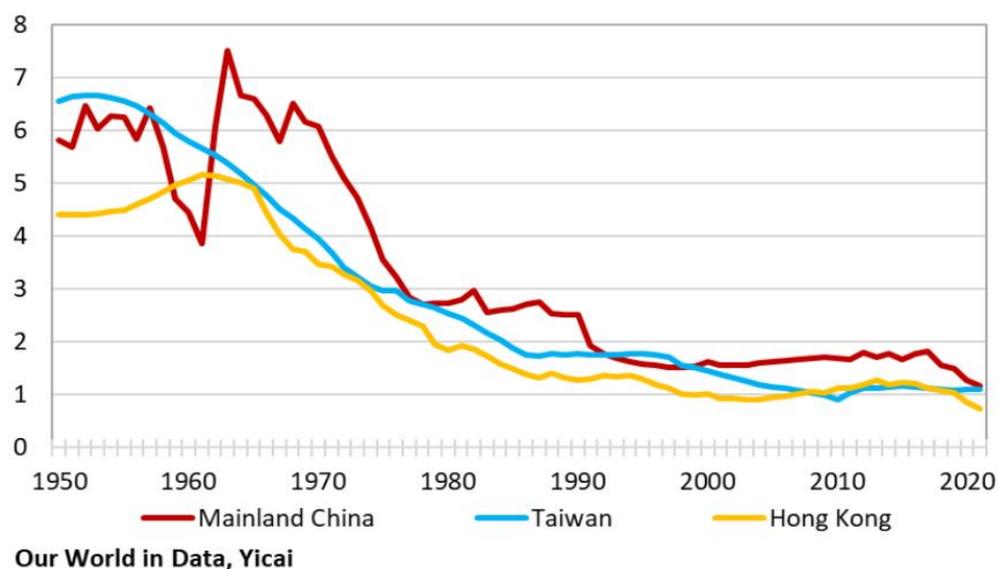
鉴于受教育的机会增加，更多妇女决定推迟生育，减少生育，或者决定完全不生育。

图 6：高等教育中的女性入学人数



很多人将中国大陆的低生育率归咎于独生子女政策。然而，在 1978 年和 1980 年之间逐步实施该政策时，生育率已经下降了一半以上。此外，中国大陆的生育率轨迹与没有实施独生子女政策的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非常相似。大约在 20 年前，中国香港的生育率下降到 1。10 年前，中国台湾的生育率下降到 1。中国大陆现在正在接近这个水平（图 7）。

图 7：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的生育率



并非只有中国妇女倾向于少生孩子。如上图 5 所示，韩国和日本妇女也比其他 G20 国家的妇女更倾向于少生孩子。

蔡勇和菲利普·摩根 2019 年的研究表明，这种倾向可能受文化因素影响。他们研究了在美国生活的中国、日本和韩国裔妇女的生育行为。与美国的白人妇女相比，这些亚裔妇女倾向于推迟生育，生育数量也更少。

这并不是因为亚洲妇女受教育的水平更高。同一受教育水平下，亚裔妇女的生育率均低于白人妇女。此外，亚裔妇女对小家庭的偏好与生俱来。在美国出生的中国、日本和韩国裔妇女的生育率与原籍国一致。

那么，政策制定者应该如何应对中国人口总数下降带来的影响？

我提出以下两点建议：首先，政策制定者可以提升资源的配置效率。例如，可以促进劳动者从农业等劳动生产率低的活动中退出，并鼓励进一步的城镇化。王萍萍表示，中国的城镇化率在 2022 年达到了 65%，较一年前提高了 0.5 个百分点。在发达经济体中，大约 8 成的人口居住在劳动生产率和薪资更高的城市中。

其次，政策制定者可以对劳动者的人力资本做出额外的改进。王萍萍表示，中国工作年龄人口（16-59 岁劳动年龄人口）的受教育年限持续上升，在 2022 年达到了 10.9 年。这是一个好消息。受教育年限增加将提振劳动生产率，有利于完全抵消人口数下降带来的影响。